

•智库要闻•

“拓展我国区域发展新空间研究”第七期东吴智库思享汇举办

16 月 29 日上午,第七期东吴智库思享汇在凌云楼智库会议室举行。本期思享汇以“拓展我国区域发展新空间”为主题,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长城学者”安树伟担任主讲嘉宾。思享汇由东吴智库执行院长段进军教授主持,东吴智库研究员、课题组成员参加了本期思享汇。

安树伟教授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历程谈起,分析了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表现与特征,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由东部带动为主转向东中西共同带动为主;区域分异由东西分异转向南北分异;部分区域城市收缩问题突出;区域经济从竞争为主转向合作为主,省际交界区域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国家重点关注的区域;区域政策的尺度日益多元化;区域经济增长新动力正在孕育;我国区域空间发展面临新形势。

安教授提出,区域发展空间的类型可分为第一代区域发展空间、第二代区域发展新空间和第三代潜在区域发展新空间。

他认为,拓展区域发展空间要以“轴带引领、城市群(都市圈)支撑、群区耦合、陆海统筹、梯次推进”为重点,打造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经济带,提高城市群功能,强化区域性中心城市服务功能,构建经济联系相对紧密、受到城市群辐射带动的规模较大的经济区,加快陆海双向走出去步伐,形成区域发展空间梯次推进的发展格局,为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奠定区域基础。随后,他以京津冀地区与广东省为案例,分析了经济空间格局变化特征以及区域发展新空间和潜在发展新空间的选择。

安树伟教授长期以来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工作,具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报告结束后,与会师生就区域合作、区域协调、地理空间演变等



相关问题与安教授作了进一步探讨。执行院长段进军教授对安树伟教授的精彩分享表示感谢,并表示区域发展新空间是基于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学科交叉研究成果,研究意义重大,有助于突破学科内思维定式禁锢,在学科交叉中寻求新的增长点。

思享汇是东吴智库重点打造的开放式学术活动品牌,邀请专家学者围绕前沿问题开展学术研讨,旨在开拓学术视野、打破学科壁垒,自 2019 年以来已举办七期。

东吴智库研究员王俊教授接受《中国经营报》专访

编者按:近日,东吴智库研究员王俊教授接受《中国经营报》专访。她表示,吴江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可以与上海青浦、浙江嘉善实现协同发展,共同贯彻落实国家战略,紧抓沪苏同城化机遇,筑牢产业发展“支点”,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吴江样本”。现将相关报道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吴江样本”

在《财富》杂志“2020 年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中,江苏省有 4 家企业上榜,其中苏州共有 3 家企业入围,而榜单中的恒力集团和盛虹集团均来自苏州市吴江区的盛泽镇,分别位列第 107 位和 455 位。

一个乡镇占据了江苏全省世界 500 强的半壁江山,这正是苏州市吴江区在民

营企业和乡镇经济发展中的过人之处。

作为江苏省的“南大门”和对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桥头堡”,吴江区还经常出现在各类百强排行榜中。在赛迪顾问城市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2020 年中国城区高质量发展白皮书》中,吴江区位列百强榜第 12 位,同时位居苏州市第一和江苏省第二。

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吴江区 GDP 首次突破 2000 亿元大关,达到 2002.83 亿元,迈上了历史性新台阶。在两项收入方面,吴江区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6.48 亿元,增长 6.0%;2020 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9997 元,增长 4.3%。

高起点发展的吴江区还面临着一系列利好机遇。2019 年,江苏自贸试验区苏州片区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以下简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先后揭牌,吴江区均位列其中,大幅提升了区域发展的站位高度,打开了吴江的区位价值“窗口”。

“示范区和自贸区的两区叠加效应,为吴江区的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和可能。”东吴智库研究员王俊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吴江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可以与上海青浦、浙江嘉善实现协同,共同贯彻实施国家战略。

抢抓“沪苏同城化”机遇

5 月 20 日,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消息称,从即日起开始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试点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购房贷款业务,这其中便包含苏州市吴江区。

·智库要闻·

看到这个消息,王俊并不觉得意外。在其看来,吴江区最大的制度创新优势就在于,在实施国家统一的战略方针时还能坚持自己的个性化探索。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苏州市委、市政府力图实现沪苏同城化,全面落实学习、对接、服务、融入上海的部署;二是吴江自身以水乡特色和民营经济为主要经济特色,做了诸多试点和探索。”王俊表示,比如,在修通“断头路”时率先实施共同标准,跨区域进行人才培养等。

近年来,站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下,“沪苏同城化”作为苏州一项抢抓发展机遇的具体战略应运而生。“苏州就是要在上海这个龙头的牵引、辐射和带动下,在江苏发展的总体布局之下,本着‘上海需要什么、我们服务什么’的原则,做更多‘上海得益、沪苏共赢’的事。”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表示。

对于如何加快推进“沪苏同城化”的问题,吴江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给出了个性化的解答:坚决扛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担当,服务好上海这个长三角的龙头、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在“沪苏同城化发展”中找准定位、主动作为,为长三角区域推动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先行示范。

人才、科创是上海的主要优势,而这也是产业基础雄厚的吴江区面临的主要短板所在。

“吴江毕竟只是区县级,高端人才在过去很少过来,但吴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王俊表示,目前,吴江正在引进一些大学,包括苏州大学也将在此设立校区,今年9月即将迎来第一批新生,开设的主要是与当地产业发展相关的专业。吴江还缺乏一些大型的科学中心等设施,这一点可以借助上海的基础优势来弥补,长远来讲会产生很好的溢出效应。

而在引进人才方面,以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吴江开发区为例,截至目前,吴江开发区引进高学历、高技能等各类人才总数达7.6万人;累计培育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33家,获评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1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两家等。

“我们计划在上海、北京和深圳等科创资源要素集聚区设立子公司或办事处,加大一线城市高端人才项目的引进和孵化力度。”据吴江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还将推进“人才+科技+基金”项目落地评审机制,探索市场化、社会化引才渠道。

同时,吴江开发区还将力争在3年内新增不少于100亩科创专业园区用地,新增不少于10万平方米科创载体,力争在3至5年内孵化培育出100家左右科技创新型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吴江正式启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工作,并发放额度1000万元的吴江科技创新券。

一位当地官员告诉记者,吴江科技创新券是长三角创新券体系的首次尝试。以科技创新券为载体,可以将长三角地区的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到一个平台,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科技成果引进转化,推动创新发展,成为科技服务能力跨区域流通交易的有效方式。这也是吴江借力上海人才和资源优势进行的重要尝试。

“上海的科技金融发展处于非常前沿的地位,而吴江在金融如何支持科技发展等方面虽然做了一些探索,但目前远远不够。”王俊表示,所以在我看来,吴江最需要对接上海的,除了人才和技术引进之外,还要学习如何用科技和金融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创新发展。

筑牢产业发展“支点”

活跃的民营企业一直以来都是吴江的重要标签,也是吴江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和优势所在。

2021年5月12日,苏州明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志科技”)和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鸣锣上市,创下长三角地区首个区县科创板“双响炮”的先例。

这背后离不开地方国有创投机构的助力。2008年注册成立的吴江东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运创投”),是吴江第一家在江苏省发改委备案的创业投资机构。天眼查显示,该公司系吴江经开区管委会通过吴江经开区发展总公司设立的全资孙公司。

明志科技成立于2003年,是国内高端制芯装备行业的“领军者”,自主研发的铸造用冷芯盒自动制芯设备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19%。2019年,东运创投向明志科技投资2000万元。到了第二年,明志科技销售同比增长了20%左右,为成功上市提供了重要支撑。

“截至2020年末,东运创投持有上市公司市值40亿元,累计收回现金超过5亿元。”在吴江开发区负责人看来,吴江把国资投融资平台打造成了撬动社会资本的支点,通过产业基金和资本运作等方

式,与国内外优秀的投资机构开展合作,加速引育、精准孵化智能制造、半导体芯片、高分子材料和高端医疗等科技型人才项目,实现了创投赋能高科技产业集聚发展的目标。

另一方面,吴江还把目光瞄准了总部经济和数字经济。《苏州市吴江区产业发展规划(2020~2035年)(征求意见稿)》指出,将聚焦培育凸显功能品质的“特”色服务经济,其中便包括总部经济和数字赋能服务。而《吴江开发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2021年工作要点》更是明确,将大力培育功能性总部经济、大力培育融合型数字经济。

在王俊看来,总部经济和数字经济是全国各地都在追逐的热点,主要因为总部经济的带动效应比较大,而数字经济代表了转型方向,所以吴江往这些方面发力也是很正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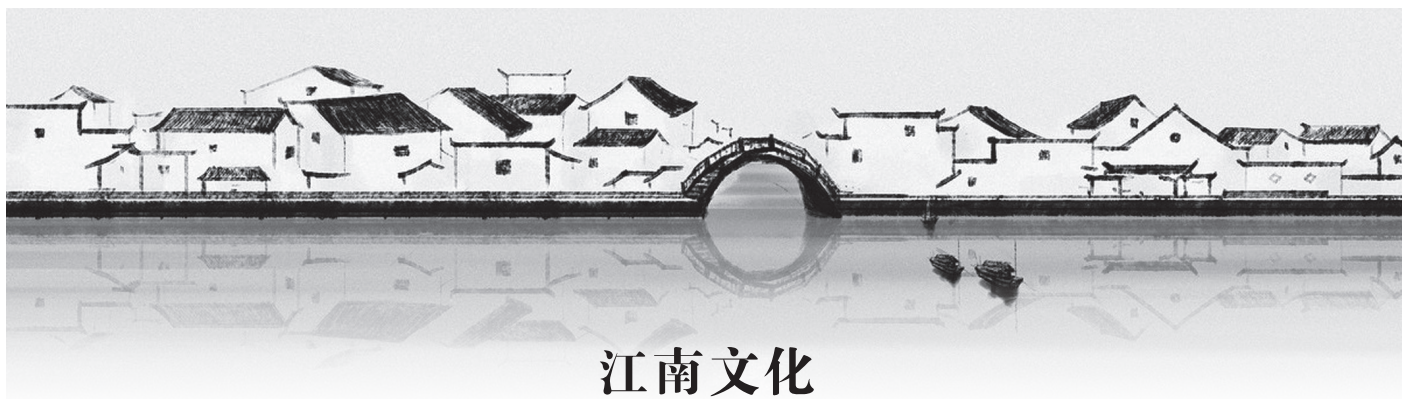
“发展数字经济,我们以亨通光纤、迈为科技和博众精工等龙头企业为引领,加快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吴江开发区负责人坦言,在2021年,将率先实现350家规上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全覆盖,大力推进“企业上云”工程和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创建,以“数字+”为传统产业赋能;同时强化在智能工业、跨境电商、智慧农业和智慧旅游等领域的发展优势,全力打造全国智能工业示范区和数字经济样板区。

值得一提的是,4月29日,在2021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吴江)上海投资说明会上,吴江开发区云梨路总部经济带设计方案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这里将被规划为产城融合发展核心区域和总部经济集聚高地,计划引进企业总部、金融机构、商务办公等高端业态。

“发展总部经济,吴江也需结合自身产业结构的特点进行个性化选择。”王俊指出,丝绸行业在吴江本来就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但这些年已经有些赶不上杭州的发展步伐。杭州丝绸在引入新的技术手法后,对其普及化、高端化和时尚化都有很大影响。所以吴江在引入企业总部时,需要与传统优势产业的研发环节关联起来。

王俊还认为,目前吴江仍比较欠缺律师、会计和检测等专业服务人员,在发展总部经济时可以优先引入这些专业服务机构。同时,由于吴江地处交通枢纽的核心地带,提前布局物流总部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江南文化•



江南文化

“江南”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江南文化的历史积淀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凝聚力的重要动因,江南文化的传承创新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汇聚思想智慧、提供精神支撑。

近日,新华传媒智库约请东吴智库多位专家学者展开研讨,解读江南文化的源与魂。《新华日报》专版刊发了专家们关于江南文化的文章,并被学习强国、交汇点、新江苏平台转发。现将各专家观点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在传统中激活江南文化的“当代性”

王 尧

在文化层面上,“江南文化”是长三角的最大公约数,长三角一体化因而也是“江南文化”传承与转型的过程。如果忽视江南文化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意义,我们就不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长三角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文化的动因十分重要。

以苏州为例,当我们说苏州“最江南”时,不仅是确认历史、确认典型性,也从一个方面解释苏州何以发展的原因。苏州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往返而呈现新的气象。我们可以信手拈来关于苏州的种种赞誉,这些堪称奇迹的成就都发生苏州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以及以它为中心的城乡地带。当代苏州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这一发展给苏州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发展是整体的,不是局部的,如果没有文化的守护和发展,苏州就是残缺的苏州。2500 余年的历史仍然绵延不断,但现代化的景观同样灿烂辉煌。于是,一个经典性的表述生成为:苏州是传统与现代的“双面绣”。当这样的比喻生成时,“文化苏州”便跃然于一城两翼之上。

因为苏州,江南元素丰富而集中,最宜众人来领略。传承久远的古城,枕河而眠的人家,粉墙黛瓦之间的小巷,信步城中或近郊即可不经意间相遇的园林与胜迹;卖菱藕的夜市,载绮罗的春船,城外枫桥夜半时分的那声撞钟响彻千年的余

音仍在。与古城相依的大运河故道是苏州的又一血脉,烟波浩渺的太湖是烟雨江南的碧蓝底色。在千年不变的景色中,江南的苏州旧而新。我们仍然生活其中,文化在生活中,生活在文化中。这是千余年来传统与现代和谐共生的典范。这让苏州成为一个传说,近乎“天堂”般的传说。传说中的苏州,便是传说中的江南,美轮美奂,浑然天成。

想象江南文化也成了诗性的文化。唐末大诗人韦庄晚年远居蜀地,却念念不忘早岁的江南旧游,他在《菩萨蛮》里写道:“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千余年以来,这两行诗句不知惹动了多少人的心肠——春水连天、画船听雨,无论是到江南一游,或者在江南生活直至老去,等闲便是我们能想见的最绮丽的梦幻和最诗意的生活。于是,江南是想象诗意生活的一种方法。更早些个几十年,韦庄的前辈白居易对江南的怀念和赞颂,比韦庄还多了几分落到实处的深情。白居易的三阕《忆江南》以“吴宫”压轴,吴地的物产之丰、人情之醇与艺文之美,尽浓缩于诗人笔下的一杯吴酒与几曲吴声之中。这还不够,在大江南区域诸多的宦迹所及之地,他偏要挑出苏州来,在赠诗里向好友刘禹锡重点申说:“江南旧游凡几处,就中最忆吴江隈。”于是,江南是苏州,苏州是江南。“游人唱彻江南词,共说姑苏美不尽。”——这是千年来文字与口耳相传的

默契。

和许多城市及城市文化不同,苏州将审美艺术与世俗生活融合在一起。昆曲曼妙的声腔与缠绵的水袖,诗人深致的热爱与婉转的歌喉;评话和弹词中的风云际会、悲欢离合与市井日常,苏绣与苏作里专注的精神和巧夺天工的技艺。更不必说绘画的“吴派”,古调不绝、传承大音的吴地琴人。——这是绵延千年赓续至今的文脉。因为生活,苏州成为日常的贴近人心的江南。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或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依然是江南苏州的日常,是每一个平常的日夜中充溢、笼罩着众人的诗意,是在诗意中栖居的寻常百姓的生活。这一泓诗意,也流转在舞台、书画、苏作和文学之中,弥漫于童子、青年、壮年和老者之间。这是千年来在慢生活中享受闲适和呈现优雅的江南。在城中年复一年生活的主人,或从城外纷至沓来的客人,无论你知晓多少苏州,苏州依然是想象的苏州、传说的苏州。当一座城市成为一个传说时,这座城市的文化便达到了最高境界。在几千年的累积、发展、回退、修复中,物质的、制度的和心理的各个层面的文化逐渐凝固成文化苏州,江南文化因此成型并将苏州置于江南文化的高地上。

当我们说苏州是传统与现代的双面绣时,关于江南文化的言说和建构,就不只是对传统的凭吊,而更多的要求我们在

•江南文化•

传承的同时如何创造现代的江南文化。文化是变动不居的,如是,有了“新苏州”有了“洋苏州”。在后来更大的发展中,古城苏州有了东西两翼,这不只是城市空间的拓展,经济领域的开辟,同样是苏州文化结构的改变。如果看不到后者,我们就错读了四十年来苏州的发展。我们现在提到的两翼即园区和新区,不是不同区

域的相加,而是文化的融合。江南文化滋养了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的进程也撬动了江南文化的板块,江南文化的新素质新形态也层出不穷。在人文传统之外,在迂回曲折的小巷之外,有科技之城,有高楼大厦,轻轨、高铁重新布局了苏州的地图。这厢是美妙的昆曲评弹,那边是动人的芭蕾交响乐。所谓“世界性”的因素在苏

州不断增加而成新气象。异质文化的融入,成为文化苏州的又一特征,这是苏州以吴文化为根基生长出的新的气象。费孝通先生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或许是“江南文化”的愿景。我们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创造现代的江南文化?

江南文学早期与江南文化地理的建构

徐国源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文学,虽然还处于萌发期,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初步建构了有关“江南”的总体印象。总的来看,萌发期的江南文学已勃发出多元、多样的创造活力,“江南才子”的文学个性和风格已初见端倪,并开始孕育和显露出江南文学特有的审美风格。

区域文化的形成,往往离不开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江南是有名的水网地带,湖泊成群,河道纵横。虽然古代江南文化同属于中国农业文化性质,但由于这里有山明水秀的自然环境,有山峦、丘陵、平原、河湖荡泊等多种地貌,加之气候温润、雨水充沛的优越自然条件,便形成了古江南文化独特的生态个性。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虽没有“吴风”,但并不说明那时没有吴歌存在。其实吴越楚地区的民歌起源极早,可追溯到迄今所知我国最古老的原始歌谣《弹歌》。据《吴越春秋》卷九:“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之谓也。”顾颉刚在谈到吴歌的源头问题时也具体指出,“它不会比《诗经》更迟”。

相传周公奭父之子泰伯、仲雍为避让君位,由中原来到当时被称为“荆蛮”之地的江南。他们带来的周族先进的文化和农业生产技术,化育了江南早期文明。之后,吴王寿梦的幼子季札曾出使鲁国“观于周乐”,对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的“乐”,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评论。春秋时代江南杰出的文化人,还有被孔子称为“文学”科代表的言偃(字子游)。弦歌教化是子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重视“乐”的陶冶感化作用,这种“乐教”就是今天所说的德育与美育。子游把先进的礼乐文化带到吴地,使夷蛮之民“文之以礼乐”、“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而

吴地人民赞誉他为“道启东南,文开吴会”的“南方夫子”。

秦汉时代,随着全国封建统一局面的出现及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促进了江南与外界的交往。进入到辞赋最兴盛的汉武帝时代,苏州籍辞赋家严忌、严助父子写下多篇辞赋,其中严忌哀伤屈原而“斐然作辞”的《哀时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佳作,“楚辞”这一名称在史书上的出现,也与这两位作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建安以后,文士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得到更高的评价,并表现出文学的自觉精神。陆机可说是“自觉”地从事文学创造活动的第一人。他以南人的身份跻身于北方文坛,凭借自己的大才而被钟嵘《诗品》尊为西晋时期的“太康之英”。而同时代以思莼鲈而归乡的张翰,和东汉唱着《适吴诗》来吴的梁鸿一起,对江南乃至全国的隐逸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东晋,杨羲不仅是茅山上清派道教的第一代宗师,还以大量的道教诗歌表达了浪漫主义的“玄义”。

在南朝文学中,吴歌值得注意。“吴吟”是江南吴地特有的一种歌唱形式。《乐府诗集·吴声歌曲》引《晋书·乐志》说:“吴声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南朝吴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后人写过不少拟作,而且唐代的五绝也是在其基础上形成的。

至此已可以看出,早期江南文学虽处于萌发期,但它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已占有特定的地位,同时它还还为江南文学后来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对于这一源头部分,从江南文化地理建构看有几个特色值得总结:

首先,江南文学的开篇部分相当精彩。仅就收录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有

名有姓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和理论批评家来看,就多达百余人。南朝的陆、张、顾等姓诗人,几乎全有家族性的文学传承,“江南才子”的文学个性和风格已初见端倪。另外,江南文学一开始就显示了文艺理论批评的绝对优势,涌现了季札、言偃、陆机等批评大家,在全国均有重大影响。

其次,“江南”已作为文学地理现象,为中国文学增添了鲜亮的色彩。自汉以来,江南强烈地吸引着全国各地作家生动地描叙江南带有传奇色彩的人和事,如: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中的《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班固《汉书》的《朱买臣列传》,越地作家赵曄的《吴越春秋》等名篇佳作就应运而生了。而左思使“洛阳纸贵”的《三都赋》之一的“吴都赋”,铺采摛文,描述古吴的历史、地理、风物和文化,首开了为江南名城(苏州)作赋的传统。

再次,江南文学审美风格开始孕育和显露。历史地看,阳刚尚武的传统来自古吴先民断发文身、尚武好斗的风俗民性,吴国专诸刺王僚之悲壮剧,战国时“操吴戈兮被犀甲”之名句等,又助推了阳刚风气成为地域性格之一端;尚文传统则源自子游的儒学南渐,而晋陆机进而透露出的清丽、清新、工巧、细腻的阴柔风格的因子,六朝的江左风流,又逐渐培育了江南人儒雅尚文的传统。这两个传统或起伏或并存地交织着,对后世江南文艺的审美观念影响至深。

江南文学史的源头部分还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但无疑江南文学早期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它已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源头,孕育、深化了江南文化底蕴,并成为历代江南人不断汲取的宝贵精神源泉。

•江南文化•

挖掘江南水乡古镇人居环境的营建智慧

雷 诚 曹惠敏

千百年来,江南水乡古镇不断被人们赋予深厚的栖居意蕴,其选址布局、水系规划、园林营造、景观塑造等营建智慧,谱写着江南文化特质与审美情趣的魅力之歌。因而深度挖掘江南水乡古镇营建智慧是传承江南文化基因、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度地:“象天法地,巧于因借”的区域观

人居环境核心在于选择宜居的空间环境。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象天法地”的朴素环境观——在大尺度自然环境中“度地”,探寻融合相生的居址。江南水乡古镇在营建之初就将自然、城、人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进行整体考量,成为“巧于因借、因地制宜”的营城典范。其精髓在于:一是放眼区域,生态选址。依托自然环境,兼顾城防和宜居,在太湖平原平坦地形中“相土尝水”锁定城市安全基因,在水网密集地区构建生态景观协调的区域城镇地理格局。二是巧借山水,形胜构形。因地制宜将城市风景格局扩大、巧借城外美景,将外围自然山水风景“借”入城中——钟灵毓秀“十山九湖”得以成为姑苏城“因借”美景。如此“因形就势”之“形胜”是崇尚自然山水的高度美学概括。

理水:“推理酌情,因水利导”的生态观

古人将地域水脉水系视为“地之血脉”,“理水”即为调节大地肌理和脉络。

江南古镇极为重视水源供给和水系调整,逐步形成“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得其利而避其害”的理水思想和治水文化——理水既要结合水环境规律以趋利避害,也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纵观江南水乡古镇人居千年史,正是一部不断“治理水、规划水、利用水”的文化匠作。“因水利导、以水为生、枕水而眠”,江南城镇利用水环境达到极致——水系成为城镇生长的骨架和脉络,“水陆并行”决定了街道、建筑和城市开放空间的总体格局,水网成为联络城镇物质空间的支撑体系,缔造了“人家尽枕河”的特色人居环境,实现了城镇与自然环境的完美融合。

营城:“形势相依,和谐宜居”的空间观

先贤对山水脉络和自然轮廓的总结称为“自然之势”,对城镇内部环境和建筑布局的概括谓之“城廓之形”,营建强调“形与势”相结合、“因势利导、随形就势”。江南水乡古镇交通体系充分与水网体系衔接,形成了“水陆相邻,河街平行”双棋盘式的规划格局,铸就了我国江南水网城镇空间规划的独特机理。城镇功能空间强调生产生活分区、隔坊共街的布局结构,形成以坊市划分工业功能、促进手工业集聚效应和生活效应的生产生活模式,成为古城镇生产居住系统的瑰丽遗产。聚落民居空间组织强调外街内巷,形成“街—巷—院”的有机单元——外街常与河流结合,街巷共同形成居民公共生活、休闲娱乐的集体记忆空间;以坊院为社区、以民居院落为基本居住单元,“不

求气势恢弘而层次丰富、不求壮丽开阔却秀雅深远”,共同谱写出和谐宜居的生活乐章。

造园:“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观

江南园林始于春秋,兴于晋唐,盛于明清,以写意山水的高超艺术手法,蕴含浓厚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内涵,历史之悠久、艺术之精湛、影响之深远,成为江南城镇营建智慧的重要源泉之一。江南园林文化对水乡古镇的影响在于:一是“城中园”,“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师法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创造出具有诗情画意的景观,“无声的诗、立体的画”;用种种造景手法构成引人入胜的景象,“咫尺之内造乾坤”,在有限空间营造出巧妙多变的景致和文化胜境。二是“园中城”,“三万顷太湖裁一角,七十二山峰雾一片”。“叠山、理水、建筑、花木”四大造园要素和冶园方法的推广,推动着“文人士子”孤芳自赏的雅文化向城市大众文化的变迁,私家园林造园艺术向城镇公共艺术的普及和转化,体现了园林文化对城镇营造的影响和作用。

塑景:“城景一体,诗意栖居”的风物观

江南水乡城镇在营建过程中不断塑造和完善自然人文风景,这种城镇“景致”的塑造古称“塑景”。“八景、十景”等均涵盖了城镇内外的人工和自然的特色景致,景点题名的功能丰富,点拨画题、刻画意境、解说典故等,“城景一体”成为江南水乡城镇不可或缺的城镇特色之一。在景致主体上,以自然山水环境为基础,经历代文人不断创造、提炼和传颂而广为人知,兼具文化厚度和艺术之美。在景致内容上,建筑、环境和人所构建的人居环境体系为核心,融入诗情画意和文化背景,体现了城镇人居环境和谐之美。历史各时期景致塑造随着人居环境发展常有十景更替之变,郊野景致变化和造园营城之风相结合,奠定了江南水乡“人间天堂、诗意栖居”的文化地标。



•江南文化•

成境：“兼容并蓄，人间天堂”的境界观

“境界”是城镇内涵与品质的高度凝练，是人居环境建设的最高层次。江南水乡城镇有高度发达的文化水平与精神品

质，其境界源于对自然山水环境的诗意解读。历经千年发展，江南人居建设的特色与格调境界不断提升，其智慧涵盖了“山水之境、人文之境和天地之境”三个层次。山水之境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境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是城市境界之根本，是人居环境相处的和谐之道。人文之境是对

城市人文内涵的高度概括，兼具传统与现代、经典与创新的文化双面绣，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天地之境是对于自然与社会追求的统一性与和谐性，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的同时，强调“天人合一”——“天、地、人、居”和谐共生，这是中国古代营城思想的最高境界。

数字化时代，用四个“I”加持江南文化

陈 一

从地理范围上看，江南文化基本覆盖了长三角区域，它是人们在此长期生产、生活、交往中形成的精神财富，是这一区域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符号代码，也历来是中国对外展示形象的一张名片。长三角区域的城市各具特色，但也有着明显的“文化公约数”，行走其间，粉墙黛瓦、鱼米茶桑、书香绵绵、弦歌不辍。

江南文化在历史上的形成，与自然禀赋条件、政治经济变迁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浸润在江南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当前，伴随着当下全球化、信息化的进程，发源和兴盛于农耕文明时代的江南文化，何以发挥超越时空的更大价值？江南文化和数字文化的浸润，能否在当代人身上和谐统一、相得益彰？

不妨来看昆曲的例子。打开“喜马拉雅”“抖音”等手机软件，用“昆曲”作为关键词搜索，会发现海量的名家作品选段、台前幕后短视频都汇聚于此；票友们看戏听曲、唱和雅集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指尖就能实现。

如果说学者研究和各地昆曲院团做的工作是经典意义上的江南文化传承，那么新媒体上的昆曲是数字化时代江南文化的大众化之路。数字化时代的昆曲，之所以依然被人们热烈拥抱，在于它回应与补充了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古今对话的一种可能。江南文化的各种

品类，需要借助新媒体、数字化等手段，创新呈现内容、开辟传播场景、聚拢用户流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全球文化与文明的竞争中，找到江南文化、中国文化的位置。

新技术不仅意味着传播渠道的拓展，也应该看成是江南文化在当代发展的环境：它重构了江南文化的载体，延展了江南文化的内核，优化了江南文化生产和传播中的要素配置。当人人都在“数字化生存”的时候，江南文化必须要用新方法活化、优化。2020年，一家上海的游戏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江南百景图》的手机游戏。游戏设计者考察了大量的古代资料和文化遗存，用数字技术还原出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苏州留园等，让玩家直呼“意难平的江南梦，尽入此画中”。

并非只有游戏和短视频才能“加持”江南文化。就在最近，苏州在上海国家展览中心设立了集中展示“苏州制造”和“江南文化”的“苏作馆”。除了传统的线下展示功能，游客扫描二维码，苏绣、核雕、玉器等就能“诉说”自己的故事；站在多媒体展示柜前，苏扇制作流程就能全方位展示出来。同时，“苏作馆”开辟线上“云展览”，引进网络“直播带货”，打破展销边界，打通观展渠道。

数字化时代的江南文化，不仅要回望经典和古典的江南，还要展示当代和当下的江南；不仅要传承江南地区有特色的器物文化，还要参与构筑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据此，要围绕江南文化考虑四个“I”的问题，以新媒体手段为江南文化画像，为江南文化发展赋能。

第一是从 Idea（创意）到 IP（知识产权）的衍生链条。江南文化是一座富矿，可以不断从中挖掘新的

内容。文化 IP 的孵化成功绝非易事，从一个个灵光一闪的创意到最终推出的文化产品，是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飞跃。虽然难度大，但是毕竟有些共通的东西。例如，古为今用的道理在互联网上颠扑不破，用户意识、数据意识等互联网思维也需要与文化创意和 IP 孵化对接。2020 年第二届全国数字人文年会上表彰了上海博物馆开发的“董其昌数字人文展示系统”，项目通过数据分析、可视化处理，展示董其昌生平、交游、以及人脉关系，并将机器学习引入到书画研究，还原出一个以董其昌为中心的晚明时代的艺术生态圈。

博物馆做的 IP 产品是非盈利的，但市场的力量绝对不能忽视。长三角多地都在尝试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留存城市记忆的产品，促进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方式的融合，这是一个助力文化产业升级的好思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支持创意、保护知识产权、宽容失败的态度。

第二是从 Icon（符号）到 Identity（认同）的传播链条。符号是视觉化的呈现，可以把抽象的观念落实到具体点位上，这需要精心策划和巧思设计。符号化的操作，便于人们迅速切入有关文化的内涵，接受其承载的意义。让传统文化符号焕新，让新的文化符号出彩，就能不断丰富江南的意象。从接受符号到认同文化，又是一次次重大的飞跃。要让“近者悦、远者来”，不是靠简单的吆喝，而是应以有趣味的内容聚流量、以有分量的内容赢口碑，将互联网之力融入江南文化发展的大局。通过提升江南文化的塑造力、感召力、影响力，最终让今天的人们找到爱上江南的浪漫理由、唤醒对江南文化的深层渴求，从而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文化底色，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互鉴提供文化标识。



• 专家观点 •

全面提升党建质量为小康社会提供保障

方世南

编者按：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奋斗目标。回望奋斗历程，苏州以其独特的贡献，成为世人瞩目的鲜活样本。

近日，东吴智库首席专家方世南教授受邀参加苏州日报的“众说学习·苏州答卷”专题，提出苏州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要加强党的建设，从思想、组织、人才队伍、能力这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作用。

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苏州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思想保障；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制度体系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组织保障；通过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人才队伍保障；通过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法治型党组织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能力保障。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思想保障。苏州高度重视加强思想理论学习，扎实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促使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在广大党员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促进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明确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牢固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

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稳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着力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对党忠诚、树立清风正气、勇于担当作为，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广大党员自觉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收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实际成效。

加强基层党组织制度体系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组织保障。“欲筑室者，先治其基。”苏州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将基层党组织看作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重要基础，看作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看作是推动小康社会建设的强大组织力量，注重把提升组织力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



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规范性文件，与党纪党规有机结合，总结推广农村基层党建常德盛的“乡情工作法”，外企党建陈惠芬的“融合工作法”，社区党建陆仁华的“仁爱工作法”，以典型为示范，切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制度体系建设，通过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党员教育管理制度建设、“三会一课”制度建设等，形成全面规范基层党组织活动的制度组合。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人才队伍保障。苏州将党的建设落实到人的建设身上，落实到培育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身上，以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这个“苏州三大法宝”激励人、鼓舞人，使各级领导干部以“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信仰，牢牢扛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责任和使命。

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法治型党组织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能力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力是关键。能力表现为能力系统，党的建设也是能力的系统建设，苏州大力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法治型党组织建设，就是为了形成与小康社会建设相适应的学习力、服务力、创新力和法治力。昆山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经验在苏州各地推广，形成了“学昆山，优服务，讲效能，树品牌”的文化氛围。苏州法治型党组织建设的开展，使法治成为苏州的一张名片，成为苏州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成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保障了法治政府、法治市场、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



• 专家观点 •

中央提出“互联网 + 基层治理”，这个问题必须注意

刘成良

编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其中指出，要实施“互联网 + 基层治理”行动，提升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东吴智库研究员刘成良副教授结合“互联网 + 基层治理”的背景，以苏州的“12345 热线”、数字化城管 App、“寒山闻钟”网络理政平台为例，探索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结合的有效路径，并提出推动政务信息化、打造智能化信息平台，是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要选择的观点。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其中指出，要实施“互联网 + 基层治理”行动，提升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2021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

伴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技术要素进入社会治理领域，并重构着国家和社会的互动模式。如何提升“互联网 + 基层治理”的效果？我们来看一些案例。



安装在上海独居老人家门上的门磁检测。(图源：上观新闻)



苏州唯亭街道集成指挥中心。(图源：唯亭发布)

在贵州，通过“云上贵州”系统，社区居民可以在家门口享受政务服务；在广州，通过有关规定规范业主决策、电子投票等行为，让业主自主推动“互联网治理”创新；在北京，社区网格化管理对及时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预警冲突起到了良好作用……

实践证明，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可以有效激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能量。而“互联网 + 基层治理”要取得实效，实践中的关键是形成完整闭环。

以笔者调研的苏州市为例，当地“12345 热线”、数字化城管 App、“寒山闻钟”网络理政平台等，都可以成为居民表达民意、反映诉求的重要平台。这些平台牵头部门各有不同，因此地方政府专门成立集成指挥中心，强化统筹协调。从流程来说，集成指挥中心建起与 50 多个部门的联系机制，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集成指挥中心受理后形成专门工单，流转给相应部门处理；指挥中心实时监控工单处置流程，处置后还会回访，定期统计各部门工单处理情况，进行考核。

这些机制的设立，提高了政府部门对百姓关心的社会事务的回应能力。

除了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互联网 + 基层治理”还能为防范社会风险提供技术支撑。

集成指挥中心可以根据大数据做出预警和研判。以上海普陀区为例，为保障小区内高龄独居老人安全，小区给老人家里安装了包括红外、水表检测、电流检测、烟感、门禁、紧急按钮在内的“智慧六件套”，一旦有意外，如电表 12 小时内读数低于警戒线，后台便立即联系社工，前往查看或短信通知家人。一位独居老人说：“高科技的东西我虽然不太懂，但街道的关心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

基于“12345 热线”等平台反馈数据，地方政府可以第一时间收集居民关心的议题。以苏南某区为例，集成指挥中心每天受理工单约 6000 件，这些工单，单个看是个体民意表达，整体看就能发现有共性

问题。政府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为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精准提供决策参考。

此外，对水电信息等生活数据采集分析，有助于群租房整治等专项行动的开展；针对河道的监测，便于专业人员及时发现污染，及时采取行动。

推动政务信息化、打造智能化信息平台，是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要选择，现在各地都在探索。但必须警惕“重技术、轻治理”的倾向，避免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片面理解为“治理手段技术化”。

首先，信息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有限的。由于技术有局限性，大量数据依然需要人力调查获取，如果缺乏有可信度的数据支撑，平台功能将非常受限。因此，若将重心置于治理手段技术化，可能使基层干部忙于各种信息的获取、验证，解决实际问题的时间反而少了。这样一来，极易造成严重的形式主义问题，使基层干部缺乏做群众工作的时间和精力，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对技术手段的过分依赖，还可能忽视老年人等特定群体需求，出现“数字鸿沟”问题。

其次，信息平台建设和维护成本高昂，需量力而行。以当前一些县级政府建设的信息平台为例，软硬件开发投入大都在千万元以上，还不包括乡镇及村庄社区层面的软硬件投入、后期维护及人工成本。实际操作中，一些地方为了打造基层治理现代化“亮点”，不顾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盲目建设高大上的平台，得不偿失。“为创新而创新”不可取，改革不能脱离和超越实际。

治理过程是政府与人民发生深刻互动的过程，基层治理最重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及时了解群众关心的大事小情，需要干部深入基层，扎实做好群众工作，激发人民解决问题的主体性，探索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技术要素应成为提高这一治理过程效率与科学性的助力，而不是替代了治理过程，更不能成为形式主义的温床。

说到底，用新技术手段发现问题固然重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加重要。

• 专家观点 •

腐败低龄化的显著特征与针对性预防

周义程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干部队伍年轻化趋势，腐败低龄化成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腐败低龄化通常呈现出行为主体业绩突出或身处关键岗位、经济腐败为主且腐败目的多样、小吏大贪现象较为突出、高智商高科技犯罪较为常见等显著特征。与“夕阳腐败”“中年腐败”相比，腐败低龄化通常难以找到某个单一的主因，而是表现为主客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有效应对腐败低龄化问题，需从教育、监督、制度等方面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近日，东吴智库研究员周义程教授在《人民论坛》撰文，深刻剖析了年轻干部腐败的显著特征以及该现象的成因，并针对腐败低龄化提出预防措施。

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在干部年轻化这一用人导向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但从近年来纪检监察部门发布的违规违纪违法案件来看，与干部队伍年轻化趋势相伴随的是，年轻干部腐败案件时有发生，腐败低龄化现象突显。2021 年 3 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年轻干部要时刻警醒自己，培育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也特别指出，要“高度关注年轻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加强教育管理监督。”有鉴于此，系统总结腐败低龄化的主要特征，深入考察腐败低龄化的成因，针对性地设计预防腐败低龄化的具体措施，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腐败低龄化的显著特征

腐败低龄化作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通常是指一部分走上工作岗位不久、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 35 岁及以下的年轻干部甚至“90 后”却因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而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在人们的日常认知中，通常会认为位高权重的中年干部或临近退休的干部更容易发生职务犯罪，但相关的案例一再表明，年轻干部腐败正在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

注和亟需引起足够警惕的社会问题。例如，2020 年 3 月 25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北京市的三起年轻干部腐败案件，其中两人为 90 后，一人为 80 后。职务犯罪中“35 岁腐败”“30 岁腐败”等“朝阳腐败”现象与“59 岁腐败”“49 岁腐败”等“夕阳腐败”“中年腐败”并存的事实表明，腐败的发生概率与年龄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从总体上看，年轻干部的平均学历比中年干部要高，但学历高并不等同于抗腐能力强、廉洁程度高。其实，就腐败而言，不存在高危人群，只存在高危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就是高危权力。这种权力无论掌握在年轻人抑或年长者手中，都容易出现腐败。当然，不同的人，腐败的动机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性。腐败低龄化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显著特征：

第一，行为主体业绩突出或身处关键岗位。出现贪腐行为的不少年轻干部工作能力和成绩都较为突出，学历通常也比较高，其中不乏名牌高校的毕业生，可以称为社会精英。这些年轻干部因为能力、业绩和学历出众，年纪轻轻就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有的还成为单位一把手。有的年轻干部虽然没有身居高位，但他们所在的部门或岗位经常是权力较为集中或资金较为密集的部门或岗位，因而手中往往也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或资源。也有的年轻干部只是普通的办事人员，工作业绩也不突出，但其占据了财务、出纳、税务等资金密集或权力集中的岗位，因而掌握了便于腐败的“小微职权”。例如，某县级市社保中心 90 后办事人员茆某利用职务便利，分 46 次贪污社保资金 270 余万元。

第二，经济腐败为主且腐败目的多样。出现贪腐行为的年轻干部往往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其腐败问题以经济腐败为主，主要包括收受贿赂（如为商人谋求不正当利益并收受其贿赂的赃款、为亲朋好友多丈量拆迁房屋面积以套取征地补偿款并拿取一定的“回扣”）、贪污公款（如通过虚报项目的方式套取扶贫资金、利用职务之便和监管漏洞骗取社保基金）、挪用公款（如利用职务便利将单位公款挪为己用），等等。从腐败目的来看，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有的为了美色而腐，将

贪腐所得用来频繁更换女友或包养多个情妇或打赏网络主播；有的为了赌博而腐，将贪腐所得拿到赌场寻求刺激；有的为了游戏而腐，将贪腐所得拿来升级游戏装备和购买游戏点卡。从查办的案件来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不少落网的年轻干部的涉案资金已经挥霍无几。

第三，小吏大贪现象在违规违纪违法的年轻干部中较为突出。因为工作年限相对较短、年纪相对较轻，所以年轻干部的职务大多在科级、处级或科处级以下，有的年轻干部甚至没有担任领导职务或没有行政级别。当然，也有个别年轻干部担任单位主要领导甚至“一把手”。从总体上看，年轻干部的职务虽然不高，但是胆子却比较大，从事工作没多久就走上了非法敛财的违法犯罪道路，心中缺少对法律的基本敬畏，也没有起码的良知和道德底线，而且涉案金额经常比较大，小吏大贪现象在违规违纪违法的年轻干部中较为突出，其中贪腐金额超过我国《刑法》规定的三百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的不在少数。例如，拥有某名牌大学硕士学历的 32 岁的肖某 4 年受贿 1600 多万元；28 岁的陈某两年内挪用近 2700 万元公款；袁某利用手中权力为亲属承揽的工程项目超过 10 亿元。

第四，高智商高科技犯罪较为常见。与以现金交易为主的传统职务犯罪手法不同，年轻干部大多学历较高，对现代信息技术掌握得相对较好，出现的腐败行为也体现出高智商高科技的行为特质。高智商主要体现在作案手法更加高明，更加难以被发现。例如，有的年轻干部不会直接收受现金，而是更为隐蔽地获得好处。高科技主要体现在年轻干部的腐败手段更加先进，尤其体现在运用“互联网+腐败”的方式来从事贪腐行为。例如，年仅 27 岁的王某以“黑客”身份入侵单位的信息系统窃取相关数据资料，然后转手卖出，非法获利 10.7 万多元。

需要指出的是，腐败低龄化既有自身的特殊性，又有所有腐败的一般性。对年轻干部腐败不应过度“标签化”，也不应为了预防年轻干部腐败，而简单地否定干部年轻化这一正确方向，转而变得不敢选拔年轻干部。

• 专家观点 •

腐败低龄化的内外因分析

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腐败低龄化早在 2000 年前后就已有发生,近几年这一现象较为突出。对此,需要思考的是,该现象近年为什么会相对较多? 干部腐败中的“59 岁”现象即“夕阳腐败”的主因通常是少数干部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功利心理驱使下,想在退休之前谋求更多的物质保障或获得一定的心理补偿;干部腐败中的“49 岁”现象即“中年腐败”的主因时常是这一年龄段的干部属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饼干”一族,因而急于获得更好的经济保障。与“夕阳腐败”“中年腐败”相比,腐败低龄化通常难以找到某个单一的主因,而是表现为主客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般来说,主观心理原因是腐败低龄化的内在原因,也是年轻干部腐化堕落的根本原因。腐败低龄化的主观心理原因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年轻干部的自身素养问题,即这部分年轻干部政治上理想信念丧失,思想上价值观扭曲,道德上蜕化堕落。概括地看,年轻干部走向腐败通常存在一些具有共性的心理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五种:一是攀比心理。有的年轻干部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物质条件不太好,却受到超前消费、高消费、追求奢侈品等不良消费风气的影响,在物质上盲目攀比。在这种错误心理的驱动下,有的年轻干部就可能通过腐败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物欲。二是享乐心理。有的年轻干部受到享乐主义错误思潮的影响,认为人生就应该及时行乐、尽情享受,否则就是虚度光阴、苦耗时光。在这一错误观念的支配下,因为自身的薪酬收入水平只能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所以部分年轻干部在享乐欲望的驱使下,就会选择利用职权谋求金钱来为追求奢华生活铺路。三是侥幸心理。有的年轻干部认为自己精通业务,手法高明,可以钻法律空子和利用制度漏洞而不被发现和查处,因而在做出腐败行为的时候通常心存侥幸,并由此变得胆大妄为甚至毫不顾忌。四是交易心理。有的年轻干部在功利主义思想的驱使之下,认为自己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了相应的利益,对方应当知恩图报,自己则是按劳取酬,并错误地认为这是自己应得的,因而在收受贿赂后反而显得心安理得。五是自大心理。有的年轻干部在刚走上工作岗位时,能够做到勤勤恳恳、谦虚谨慎,但在升到某个领导岗位后,就逐渐产生心理优越感,认为自己学历高、能力强、思路宽、业绩佳,从而出现盲目自负、骄傲自

满、忘乎所以、无需继续学习和提高道德素养的不良心态,并因此而变得我行我素、目无法纪。

相较于主观心理原因,外在客观原因虽然是腐败低龄化第二位的原因,但其也是年轻干部腐化堕落的外在条件。概括地看,腐败低龄化的客观环境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年轻干部所在单位廉洁教育的弱化。部分单位虽然较为重视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但对年轻干部廉洁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在年轻干部廉洁教育方面就会出现应付心理甚至滑向形式主义。二是年轻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不完备。有的单位在选拔任用干部时过分看重年龄因素、学历因素和能力因素,轻视或忽视对年轻干部党性修养、工作作风、个人品德、清廉程度的考察,导致少数理想信念缺失、道德水准低下、私心杂念浓厚的年轻干部被重用,从而为日后年轻干部腐败埋下了隐患。三是年轻干部监督管理机制的不完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政治学的公理之一。有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落实“一岗双责”制度不到位,尤其是没有切实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负责,因而对年轻干部疏于监督管理;有的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对年轻干部的监督关注相对较少,尤其是对年轻干部纪律意识、规矩意识、生活作风等相对较小的问题没能做到提前介入、及时纠偏、防微杜渐,进而导致部分年轻干部从存在小问题逐渐演变为犯下大错误;有的单位岗位管理制度存在一定漏洞,给所在岗位的年轻干部提供了腐败的机会。

腐败低龄化的针对性预防

年轻干部是国家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年轻干部腐败如果得不到及时预防和有效惩治,那么即使其在年轻时进行的是“苍蝇”式腐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务的升迁,将来也有可能走向“老虎”式腐败,过去不少落马的“大老虎”都是从年轻时的“苍蝇”式腐败开始的,而且其腐败周期可能会长达二三十年,故而所造成的危害也会相当巨大。因此,围绕腐败低龄化问题,从廉洁教育、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等方面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十分必要。

其一,着力开展年轻干部廉洁教育。年轻干部社会阅历相对较少、工作经验相对不足、各种历练相对欠缺、党性原则相对薄弱,抵制各种外在诱惑的能力相对偏低。有鉴于此,对年轻干部不能一选了

之,而是要高度重视在职期间的廉洁教育,尤其是当发现年轻干部中出现苗头性问题时,务必要及时进行提醒教育,防止小错铸成大错。通过教育,让年轻干部充分意识到腐败行为的巨大危害和巨额成本,学会算好前途葬送的成本、收入丧失的经济成本、身败名裂的声誉成本、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人身成本、心力交瘁的健康成本、家庭破败的亲情成本等六笔账,从而降低腐败的意愿,切实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意识。通过教育,让年轻干部形成正确的利益观,形成敬畏权力、依法用权、为民用权的权力美德,懂得如何辨别陷阱、避开雷区和巧妙地防止被期权投资或多方围猎。为此,一是应完善年轻干部思想监测机制。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的原则,着力构建起年轻干部思想的动态监测体系。要将关注年轻干部的生活圈和交友圈、关心年轻干部“八小时”之外的行为等作为了解其思想动态的重要窗口;要采用定期或不定期的谈心谈话和常态化约谈等手段来及时掌握年轻干部的思想动态;要针对年轻干部思想认识中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推进咬耳朵、扯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的工作。二是应健全年轻干部警示教育机制。大力推进年轻干部警示教育的建章立制,对年轻干部警示教育的形式、内容、程序等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严格防止年轻干部警示教育工作浮于表面化、流于形式化、走向非常态化。努力创新年轻干部警示教育的方式方法,灵活采用庭审现场旁听、庭审电视直播等多种形式,切实提高警示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

其二,着力完善年轻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一是坚持正确的年轻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建设导向。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就提出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不少干部在 30 岁左右就走上了领导岗位,这对于保证干部队伍的生机活力和“老中青”结合的年龄结构优化都有着显著的正面意义。不过,在倡导干部年轻化的同时,要坚决把好年轻干部的“入口关”,切莫为了干部年轻化而年轻化。应将干部“年轻化”与“革命化”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切实加大对年轻干部“德”的考察力度。应始终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好干部标准。应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有德有才者提拔重用,有德无才者培养使用,有才无德者限

• 专家观点 •

制使用,无才无德者坚决不用,从而真正将德才兼备、群众公认的年轻干部选拔出来。二是健全年轻干部选拔任用责任制度。在年轻干部选拔任用之前,要明确相关领导的选人用人责任,让领导干部在选拔任用年轻干部时更加慎重和防止晕轮效应,尤其是不能单纯因为某个年轻干部能力出众就有意无意地淡化对其个人品德的考察,或者想当然地认为其个人品德也不会差,要最大可能地防止有才无德、有才少德的年轻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在年轻干部被选拔任用之后,如果出现腐败行为,要及时追溯当时负责提拔这个年轻干部的相关领导的责任,并严格调查选拔期间是否存在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

其三,着力健全年轻干部监督管理机

制。一是完善年轻干部精准化日常监督机制。年轻干部所在单位的主要领导应当真正承担起对年轻干部的日常监督责任。年轻干部的社会经历和工作经历相对简单,所形成的问题线索相对容易被发现。比如,有的年轻干部经常购买明显超出其消费水平的名包名表等奢侈品;有的年轻干部挪用或贪污公款存在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上班时经常会没精打采、心神不定。如果所在单位重视精准化地进行日常监督,那么这些端倪都可以被及早发现,从而能够趁早开展挽救工作。同时,要健全纪委监委监督机制,将年轻干部作为监督的重点对象之一,着力加强对年轻干部“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的监督。二是完善年轻干部组织锻炼机制。不少年轻干部都没有受过艰苦环境

的历练,也缺少在基层一线工作的经验,对生活的艰辛和百姓的疾苦缺乏深切的感受,宗旨意识相对淡薄,面对外在诱惑和遇到客观困难时就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有鉴于此,应当有目的、有计划、分步骤地将年轻干部安排到条件相对艰苦、环境相对复杂、工作相对繁重的基层一线进行锻炼,藉此对年轻干部进行组织培养、组织考察和筛选淘汰。三是完善年轻干部岗位管理机制。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干部,要通过明确岗位职责权限来尽可能确保年轻干部始终在自己的职责权限范围内用权履责,尽可能预防年轻干部干涉或插手职责权限范围以外的工作;要通过岗位工作流程优化来尽可能使工作流程的各个环节更加健全,尽可能预防年轻干部钻工作流程上的漏洞。

深刻领悟伟大建党精神蕴涵的人民情怀

方世南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文,虽然只有 7200 余字,但是“人民”一词却出现了 86 次。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庄严承诺的“不负人民”的强烈情怀。

近日,东吴智库首席专家方世南教授在《苏州日报》撰文,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并提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全党要为人民利益而顽强拼搏和不懈奋斗。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短短的 32 个字,向人民庄严承诺的“不负人民”的强烈情怀情深意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文,虽然只有 7200 余字,但是“人民”一词却出现了 86 次。坚守人民情怀,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全篇,歌颂人民、感谢人民、回报人民、造福人民的浓厚感情发自肺腑。在讲话结束时,习近平总书记又用“伟大、光荣、英雄”3 个词,高度评价和热情赞颂中国人民。“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

共产党万岁!”和“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这两句响亮的口号紧紧地连在一起,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血肉相连关系。这种血肉相连关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的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中更得到了充分体现。“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短短的 32 个字,向人民庄严承诺的“不负人民”的强烈情怀情深意长。

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在任何国家的政治关系中,都处于最根本、最重要、最核心的地位,直接决定和影响其他各种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政党与人民关系的和谐程度也直接决定和影响社会的和谐程度。政党代表人民利益,人民就会衷心拥护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是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代表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

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是心心相印、脉脉相通、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那天起,就将深刻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以及深刻改变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作为首要任务,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坚决支持。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政治品格和实践宗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奥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党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正是通

• 专家观点 •

过牢记和践行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向着新的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全党更要继承发扬光大伟大建党精神，砥砺前行使命，为人民利益而顽强拼搏和不懈奋斗。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只有悟深悟透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彰显的人民情怀，才能牢固确立把人民放在心中至高无上地位的意识，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为人民共享，从而不断强化宗旨意识，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于苏州率先高质量打造长江文化示范带的政策建议

方世南

编者按：苏州襟江带湖、因水而兴，张家港、常熟、太仓是沿江三市，共有 158 公里的长江岸线。长江与苏州所有的湖泊河流都相通相融，滋养了苏州人民、成就了姑苏繁华、孕育了江南文化。针对如何提升“文化苏州”的国际形象，东吴智库首席专家方世南教授从高起点、高质量、高规格、高品位、高效率这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苏州襟江带湖、因水而兴，张家港、常熟、太仓是沿江三市，共有 158 公里的长江岸线。长江与苏州所有的湖泊河流都相通相融，长江滋养了苏州人民，成就了姑苏繁华，孕育了江南文化。2020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讲话中强调指出：“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指明了方向，也为打造“文化苏州”提出了重点内容和主要任务。苏州在全国率先倾力打造高质量长江文化示范带，是“争当

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实际举措，对大力提升“文化苏州”国际形象意义重大。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高起点编制苏州长江文化示范带建设规划。事业发展，规划先行。建议市委、市政府组织力量，成立专班，调查研究，编制长江苏州段文化示范带建设总体规划，要和大运河苏州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苏州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发展规划、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建设、生态城市建设等方面的专项规划对接。规划中要找好定位，对形式分散的长江文化遗产加强组合。建议借鉴莱茵河、多瑙河、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旧貌换新颜的经验，突出长江文化示范带建设的苏州地域特色。

2. 高质量做强做优苏州长江文化示范带文化产业。把苏州长江文化示范带建设既作为城市层面创新建设的重要抓手，又作为区域层面创新合作的重要联结，从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汲取力量，在保护传承中创新发扬，让长江文化“活”起来。要积极培育和引进长江文化龙头企业，选好江南文化产品，通过高科技活态再现苏州长江文化场景。要充分发挥苏州文旅集团作用，创新设计长江文化新产业。率先设计和建设苏州段长江文化主题公园、长江文化主题博览馆，特别是要建设好苏州长江文化故事馆，加深游客对品牌的认同感。打造一批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培育一批富有苏州长江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景区。推进历史文化与现代公共文化、文旅融合、文创产业、工业设计、城乡建设、数

字化传播、中外文化交流等事业相结合，让长江文化遗产造福现代与未来。在生态上，要持续复绿，围绕“长江大保护”抓好生态增容、污染减量、岸线减压。

3. 高规格搭建苏州长江文化示范带建设示范平台。积极建构和打造长江文脉苏州段论坛等平台，在张家港长江文化节基础上，大力推进“写长江”“画长江”“唱长江”“摄长江”“看长江”“赞长江”“说长江”“咏长江”等“长江颂”系列主题活动。实施长江文化数字化工程，搭建长江文化数字平台。持续深入挖掘传承“历史文化名城”“江南水乡”“人间天堂”等固有江南文化资源，打造一批具有苏州长江文化特色、苏州长江文化标识、苏州长江文化内涵的江南文化品牌项目。

4. 高品位打造苏州长江文化示范带文化创新基地。在国内率先发出深化长江文化研究号召，争取在苏州或在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设立永久长江文化论坛会址，参照博鳌论坛等运作。召开长江文化带建设高峰论坛，争取由国家有关部门主办并永久落户苏州。积极发起推动由苏州与江苏省、中央等有关部门共同举办的苏州长江文化节。成立苏州长江文化研究机构，在有基础的高校或社科研究机构设立长江文化研究基地或合作建立长江文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组织社科理论界对长江文化开展深入、系统研究，服务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实践。

5. 高效率传播苏州长江文化示范带知名度美誉度。运用整合营销理念，依托现代各类传播媒介，强调传播活动的一致性。整合苏州长江文化示范带资讯平台，“大气魄、大力度、大手笔”宣传塑造苏州长江文化示范带品牌形象。通过组织国内外体验周、文化节等各类活动，传递吴文化，提升长江文化、江南文化品牌效应。

